

空白的近代

—评杨斌《流动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

董 子昂¹

《流动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²（韩翔中译，八旗文化，2021年）是杨斌教授2008年出版的《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 (Second Century BCE to Twentieth Century CE)》的中译本。该书出版至今，历时十余年依旧被不断讨论，并终于有中译本面世，足以证明其价值。简单而言，《流动疆域》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何为云南”展开，时间上横跨二十多个世纪，空间上采取全球的视野，来探讨作为区域的云南的诞生，以及作为认同感的云南人意识的形成。书中展示了一种超越既往边疆史视野的云南研究的新思路。

第一章绪论明确了全书的研究目标，即探讨“中华帝国……如何将某个从外部区域转化为边陲”（第40页），而这个“外部区域”便是云南。第二章以西南丝绸之路及三条支线为线索，着重分析云南在跨区域贸易中的核心位置，并提出疑问：为什么（偏偏是）云南最终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

第三章和第四章针对这个问题做出分析。从结论来说，蒙古征服大理是云南并入中华帝国的决定性事件，而土司制度历经元明清三代，从根本上重组了云南地方的权力结构，并促使云南人这一自我意识开始形成。第三章通过跨区域或者全球的视野对南诏历史的再解读，一个在吐蕃与唐之间运筹帷幄，北上劫掠四川，南下支配骠国的南诏形象跃然纸上。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元以后不断推进的土司制度以及紧随其后改土归流使得地方权力逐渐萎缩，最终

使得云南嵌入到“中心-边缘”的框架之中，成为帝国的边疆。

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全书论述最为精彩的部分。第五章探讨云南人这一身份概念的形成。作者认为云南人意识的出现和云南的行省化有着根本性的联系。即云南是中国的云南，其中包含了中国性的前提。但作者的论述并未止步于此，云南人这个身份概念的形成不单由于中华帝国的渗透与同化，而汉人移民的地化也同时发生，两者的交织丰富了云南人自我意识的内涵，使云南人意识具有“杂合文化”与“双重身份认同”（第231页）的特征。第六章说明海洋贸易如何改变内陆局势。作者从贝币、白银与滇铜三种货币制度在云南的衰落与兴起，勾勒出云南脱离印度洋经济体系转而被编入中华帝国的“中心-边缘”结构的过程。同时，这种跨区域经济的力量以及随后的汉人移民潮也使得云南人的身份认同固定下来。

第七章把视角从边缘转到中心，主要探讨20世纪后半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识别政策如何在云南推行，以及作为“帝国遗产”的地方知识如何被中央统合与规训。最终，被识别出的25个少数民族进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

除了历时性的章节安排与多重性的空间纵横，书中还嵌套了另外一重结构。即探讨作为区域的云南的形成和作为认同感的云南人意识的产生。这两者当然互为表里：如果没有云南这一区域的诞生，“云南人”这个称谓不会出现；而云南人认同的产生过程，也意味着云南长时间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社会文化单位，即帝

国的边疆省份。但是，如果从另一个方面看，书中面对作为区域的云南和作为自我认同的云南人的研究路径还是存在很大的区别：这两种取向一个关心云南本身，将其置于两个或多个体系的交织之中；而另一个则是把云南当做通往中心的路径，解决的是中心的问题。

中译本的序和跋便体现出后一种取向。作者一再强调，“研究云南的出发点、核心和目的一直指向‘中国’和‘中国人’这两个基本概念”（第16页），“什么是中国？中国在哪里？如何看中国？这也是……研究云南历史的出发点与终极目标”（第357页）。这些发问让人想起“从边缘出发”的一系列研究。但问题是，云南只是边缘之一，要讨论“何以中国”，可以从任何一个边缘。

事实上也是如此，比如毛里和子[1]围绕蒙古、西藏与新疆以及西南这些中国的边缘的“向心力”和“离心力”讨论了中国的国家形成与民族问题。如今这本著作已经成为日本学界“从边缘出发”的经典研究。毛里在讨论西南时与《流动的疆域》一样着重分析了1950年后的民族识别。毛里指出费孝通凭借西南经验来识别民族存在的问题在于，将中华文化长期渗透的西南各民族与拥有独自历史并创立过独立政权的北方民族用“民族平等”的话语不加区别地对待，并忽略了南北的历史差异以及他们与汉人的关系。也就是说，费孝通的西南经验给他在云南进行民族识别带来了便利，而对于西南以外的非汉族群，同样的经验却很难推广。这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作者的疑问，即为何同为边疆，抑或同为曾经的“帝国”，为何云南是中国多民族共生的范本，而西藏则成为边疆民族问题的“阿喀琉斯之踵”（第37页）。

若单看西南，也存在诸多可替换的边缘。譬如吉开将人[2]探讨了湘西的苗族精英如何参与到中华民国的国家建设当中，并集合西南的非汉精英重建西南“夷苗”祖先叙事的历史过程。吉开的研究强调了以“族”而非“省”

作为为单位的认同来源。这种非汉族群跨省而居的情况在云南尤为普遍，当认同感的来源超出了省域并指向一个与后来识别出的民族并非完全一致的族群单位时，“云南人”认同中的省域边界便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再如温春来[3]通过分析宋以后黔西北地区并入帝国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非汉族群的互动，来说明中华帝国的疆域流动与族群认同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温使用“整合”，即从上至下的“治理”逻辑来解释边疆族群并入中华的一系列事件和行动。这与《流动的疆域》使用的“殖民”与“帝国”话语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于用殖民主义的视角来研究云南的界限和有效性将在后文详细讨论。

再者，既然研究旨在讨论他者的自我化，那能不能从自我的他者化，即从中华帝国的内部区域转变为独立国家的区域来探讨“何以中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今的朝鲜和越南。这么看来，作者选择云南的理由，似乎仅仅因为云南是一个合适的案例。

讨论云南本身还是从云南出发，这两种取向也体现在英文原版和中译版的标题上。原版中文标题《季风之北，彩云之南》显示出云南的地缘特性——作为“中间地带”（第232页-第236页）——云南既在东亚（云）的南边，也是东南亚（风）的北边（当然东亚和东南亚作为区域概念要到很晚才出现）。更重要是，这个标题体现出的云南本位的研究方法，从根本上动摇了一种看似坚固的单一史观，这也是作者对云南研究做出的最卓绝的贡献。相反，《流动的疆域》的关心并不在云南，而是那个疆域不断流动的“中心”。《流动的疆域》也涉及云南这一称呼的诞生，作者问到：“云南在哪里呢？彩云南端之地是哪？彩云在哪儿？”（第47页）。随即解释道：“云南一词是汉人的发明，用来称呼当地的人民与土地”（第47页）。似乎云南是傲慢的帝国统治者随手一指的区域：云在哪里，云南就在哪里；云南在哪里，疆域就在哪里。

但是，在 1904 年出版的一本法国探险家 Jules Gervais-Courtellemont[4]撰写的旅行日记《云南游记》中，笔者找到了另外的一个解释：“‘云南’是它的中文名，意味着‘在云的南面’，指示它的地理位置。这实际上是说，它位于堆积在青藏高原上的云的南面”。这么看来，如果云南的“云”不是帝国的云，而是来自印度洋的水汽随着季风一路北上，攀升到陡峭的青藏高原后形成的云，那么不得不感叹原版标题《季风之北，彩云之南》所传达出的动人诗意与精妙意涵。不过最终原版标题的八个汉字成了中译本封面上的装帧，而令人好奇的是新标题的选用是否和作者的学术意趣、出版策划乃至学界潮流有关呢。

这两种取向的交错与分离指向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从云南出发的云南研究如何可能？在这点上，连瑞枝[5]做出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连将边境社会视为“中心”，从始至终都关注各种要素和力量如何作用于云南，并促成其内部发生变化：“适应帝国制度之时，是否等同于国家内化的过程呢？不论是汉人社会还是非汉社会，其在历史中并不是以均质的二元化过程形成……这些‘非汉’人群在仿效帝国制度的同时，也以此来适应、仿效或抵制文化霸权的扩张”。除此之外，在地方语境的层面上，连指出需要注意的三个方面：文类、叙事与多重记忆。尤其作为“中心”的边境社会，文本生产必然基于某种特定的社会情境，而其中选择的叙事类型，反映出的是在多重记忆中边境人群做出的选择——这也直接和认同紧密关联。因此，倘若面对周边，最终要讨论的却是中心的问题，那么归根结底，除去对于特殊性与普遍性，以及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解有争论外，作者和葛兆光[6][7]可谓是殊途同归。

此外，绪论开头提及的中华帝国主义与中华殖民主义贯穿了整本书的讨论，可以将其看做本书的理论框架，但作者并未在概念上做出详细解释。为了减少歧义，此处借用同样用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来讨论中心（清朝）与边缘

（台湾）的邓津华（Emma Jinhua Teng）[8]给出的定义。邓认为，王朝“透过军事力量征服一片广阔的非华夏土地，他们从帝国中心统治这些遥远的土地，并将为数可观、文化各异的非华民族纳为帝国臣民”，且由于涉及到汉人的移民，这种扩张主义“既是帝国的，亦为殖民的”。

邓描述的情况确实也发生在云南。但与邓不同的是，《流动的疆域》把帝国与殖民话语拉长到整个历史的时间轴上。这就产生了四个问题。一是殖民话语能不能放在云南身上？尤其是在讨论南诏时，作者指出强大的南诏向周围扩张，并对缅甸诸王国的形成具有极重大的影响（第 135 页）。这种通过军事征服了一片非南诏的土地，并且试图通过朝贡制度来控制它的行动是殖民吗？如果是，可以说南诏殖民主义吗？如果不是，那应当如何理解呢？

二是“华化”与云南穆斯林的问题。作者用“华化”而非汉化来指称边疆“中国化”的过程。但无论使用“华化”还是“汉化”，都是基于发生在“中心”的历史作出的考量（第 24 页）。作者确实提到穆斯林在云南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第 159-165 页，第 275 页）。但问题在于云南穆斯林从未被纳入到土司制度之下，他们也不是汉或华。而“华化”潜藏的殖民二元论视角中，既非“土著”又非汉人的云南穆斯林的身份并未得到合理归置，同时文中也没有出现云南穆斯林的声音。从这点上看，站在非中心的立场，云南穆斯林的云南人认同真正触及到了殖民话语无法抵达的核心。

日本学界的研究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松本真澄[9]分析了清末穆斯林留日知识分子的认同。这些最终参加了同盟会的知识分子认同自己为中国人，同时也是世界穆斯林的一员，同时云南穆斯林知识分子将国家建设与族群延续视为一体，强调培养身为国民的回民。而木村自[10]研究了离散在北缅与台湾的云南穆斯林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回溯至云南与南明的历史（而非元！），历经 4 次移民潮，在历经当

地建立起了一套多重的且杂合的祖先叙事，即祖籍是云南，亦可以是邦隆。这些研究呼应了连瑞枝的思路，即通过不同的文类分析其中的叙事，注重其中的反映出的多重记忆，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是“本地人的声音”。

第三，如果要引入帝国与殖民话语，并且延伸到当代，那么既然有“殖民”，是否存在“后殖民”的状况以及如何“去殖民”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邓的研究中是成立的。因为她讨论的时期是清朝，台湾确实有多重的被殖民的经验，且面临着根深蒂固的殖民遗留问题。但是倘若将相同的问题意识移植到云南身上，情况变得令人困惑：云南需要思考去殖民吗？去谁的殖民？如何去？

这不得不提到最后一个问题，即如何把握现代中国的问题。云南的民族问题确实是“帝国的遗产”，但接收这遗产的究竟一个新帝国还是现代国家？从作者的行文逻辑上看，应该是前者。但既然作者旨在讨论究竟为何现代国家能够“延续和发展帝国论述话语”（第 59 页），那么笔者的问题就是，云南人如何在理解与回应这种话语？

作者指出民族概念是一个近代的发明，近年学界对于“中华民族”概念的实证研究，如黄兴涛 [11] 着眼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自觉”所做出的分析也证明了这点（虽然大体上没有超出费孝通的范围）。但对于云南来说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天朝崩溃的时刻，既然云南存在杂合的文化与多重的认同，便说明身份是可选的；既然可选，云南为何选择“中国的”？

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重回历史现场。面对 19 世纪下半叶以降的云南，需要借助作者提示的全球视野，但不将云南视为单一的边疆，而是将其放到两套“中心与周边”体系的交叉之中，即采用“双重周边”³ 的视角。这样一来，云南既是中国的西南，也是西欧的远东。在这样的视野下搜寻云南人留下的文献不难发现，来自明治日本的影响对云南人的民族国家认同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日本的近代国家思想又根植于欧洲。因此，至少有三股力量作用在这个时期的云南：西欧（英法）、清王朝、与日本。它们分别代表了三个强大的他者：一是英国人与法国人，二是满人，三是日本人。在三股合力的作用下，借用吉川次郎[13]的分析，一种主张“各省独立”，以现代国家建设为目标的“区域民族主义”应运而生。自此对于云南人来说，将来的目标便是建立民族国家框架下的“云南人的云南”，同时这样的支配性话语开始重建一种从遥远的过去一直延伸到无限将来的、连续不断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

换句话说，20 世纪后半期云南的各民族之所以能被纳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否是因为在 20 世纪的前半期，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已经排除、或是替换掉了原有的多重认同，以及其中包含的非中华的元素？这个议题因为涉及到身份的合法性问题而无法忽视，正如作者指出的，云南人意识形成是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作为现代中国的云南人自我认同的形成，在识别政策的介入之前，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作者没有提供足够的说明。因此，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之间，是不是应该还有一章，来填补 1900 年代至 1950 年代之间的空白呢？

总的来说，《流动的疆域》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毋庸置疑。书中吸收了新清史和年鉴学派的成果，也反映出史学研究的全球转向。正如作者所揭示的一样，云南从来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区域，研究云南必须采取跨区域、跨学科的视角。与此同时，以实证主义见长的日本学界在 2010 年代之后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云南研究的著作。《流动的疆域》所做的云南研究，恰好暗合了气贺泽保规[14]提出的“云南学宣言”——“主张云南拥有独自的理论构造，抑或将云南置于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中进行叙述”。期待《流动的疆域》的印行能持续给中文学界带来启发，并与日本学界一道，将云南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

注释 *

- ¹ 北海道大学国际广报传媒与观光学院博士研究生。
- ² 本文撰写基于TAAZE电子书pdf版本, 页码与内容均依据该版本进行引述。
- ³ 这个词借用自韩国学者白永瑞[12]的研究。双重周边的视角是指“同时具有在西欧中心的世界史展开的过程中被非主体化的东亚这一周边的视角, 以及在东亚的层级构造的内部被压抑的周边的视角的一种问题意识”。这种同时注意到西欧世界(“万国”)的周边和中华世界(“天下”)的周边的视角对云南研究来说十分值得借鉴。

- [10] 木村自『雲南ムスリム・ディアスポラの民族誌』風響社, 2016年。
- [11]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12] 白永瑞著・中島隆博解説『共生への道と核心現場: 実践課題としての東アジア』法政大学出版局, 2016年, p.116。
- [13] 吉川次郎『近代中国南方のメディア言説: 辛亥革命期の雲南・広西とベトナム/日本』風響社, 2020年, pp. 220-226。
- [14] 氣賀澤保規「雲南学の構築にむけて: その歴史的地政学的概観」氣賀澤保規編『雲南の歴史と文化とその風土』勉誠出版, 2017年, p.9。

*参考文献

- [1] 毛里和子『周縁からの中国: 民族問題と国家』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8年, p.66。
- [2] 吉開将人「苗族史の近代(5)」『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紀要』(131), 2010, pp.1-51。
- [3] 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 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4] Jules Gervais-Courtellemont, *Voyage au Yunnan*, Plon, 1904, préface IV。
- [5] 连瑞枝:《边疆与帝国之间: 明朝统治下的西南人群与历史》,联经出版,2019, pp.32-33。
- [6] 葛兆光:《何为“中国”: 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
- [7] 葛兆光:《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 ——在云南大学的演讲记录》,《思想战线》,2017(6), pp.1-8。
- [8] 邓津华著, 杨雅婷译:《台湾的想像地理: 中国殖民旅游书写与图像(1683-1895)》,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 p.11。
- [9] 松本ますみ『中国民族政策の研究: 清末から1945年までの「民族論」を中心に』多賀出版, 1999年, pp. 289-296。